



新文化



月刊

1981/2

电影文化

第二辑

(总第四辑)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研究所《电影文化》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电影文化丛刊

第二辑

(总第四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47 千字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700 册

统一书号: 10190·073 定价: 0.62 元



青年电影演员李秀明

张永泰摄



著名国际影星英格丽·褒曼



目 录

- 按社会生活自身的规律反映社会生活……鲁 勒 董辅文(1)
——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几个问题之一
王炎导演风格试析……闻 浩(12)
《啊! 摇篮》的导演构思……刘景清(27)

探 讨 与 争 鸣

- 电影的纪实性与表演的生活化……林洪桐(40)
电影表演需要斯氏体系……夏宗学(47)
哺育人物形象的摇篮……还 山(58)
电影与戏剧表演的区别……石维坚(63)

《巴山夜雨》创作特辑

- 西窗剪烛话巴山……叶 楠(69)

风雨同舟，灵犀相通·····吴贻弓(83)

——导演札记

《巴山夜雨》剪辑体会·····兰为洁(93)

关于美术片

和业余作者谈美术片剧作·····晓 草(103)

谈美术片的音乐·····吴应炬(109)

影坛漫笔

从“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谈起·····王朝闻(113)

给其他创作方法留一席之地·····白景晟(116)

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艾克恩(121)

假如是我·····孔 良(124)

——观摩外片一得

小议电影中的色彩·····洪 治(127)

外国电影

阿兰·雷乃的创作道路·····胡承伟(130)

基础知识

电影场面调度(二)·····王运晖(140)

电影词语浅释(四)·····邰苏元(148)

电影人物

著名电影导演林农·····于 日(155)

影坛上的杰出女性·····刘思平(163)

——记英格丽·褒曼

资 料 选 登

- 格里菲斯谈电影.....[美]格里菲斯(169)
周传基译
- 电影艺术理论文章索引(1977—1980).....刘桂清 辑(181)

按社会生活自身的规律 反映社会生活

——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几个问题之一

鲁 勒 董辅文

近年来,对文艺创作(包括电影创作在内)上的不同看法,又开始了争论。报刊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这是值得欣慰的事。但仍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报刊上还没有给各种意见以“平等”的地位。这里所指的各种意见当然不包括那种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见。几十年来,在文艺的一些问题上,由于用对敌作战的方法对待内部争论、武断地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使我们的事业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走过来的道路告诉我们,为了繁荣文艺事业,为了探讨真理,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双百”方针。

文艺创作中有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确是争论很久了。关于文艺如何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历史上的争论且不说,就从延安算起,也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争论虽然没有停止过,可也并没有真正展开过,大都是刚刚开头不久,便被某一政治运动所压倒,出现暂时的沉默。而这种沉默,又是个表面现象,因为孰是孰非,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近两年里,“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口号重新提起,又出现了所谓“歌德”与“缺德”之争。这些争论,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过去的争论的再一次反复(这里我们不想提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进行的所谓“革命大批判”,因为

那是一段毁灭文艺事业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的历史)。

几十年来,我们在文艺创作方面,就是吃了偏颇的亏。这里主要是领导的责任,也有我们作家、艺术家的责任。在文艺如何反映社会生活问题上,我们提出了许多口号,争论又往往是围绕这些口号进行的。这些口号是否准确,是否有科学性,是否全面,很值得探讨和研究。

“干预生活”质疑

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其中有正确的反映,也有错误和歪曲的反映;有全面的反映,也有片面的反映;有曲折的反映,也有荒谬的反映。歌颂和暴露是两种反映社会生活的主张,而且是针锋相对的两种主张。既然是针锋相对,能不能就此判定一种是对、一种是错呢?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两种主张各有其合理性。

“我要歌颂社会主义光明”。这是凭空提出来的吗?不是。现实生活中有光明,这是事实。请看,在我党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在三中全会之后,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在废寝忘食地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着。他们不以功臣自居、不以“外行”自诩(“外行领导内行”之谓也),虚心学习;他们和群众水乳交融,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一尘不染,和歪风邪气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钻研业务,在工作中做出突出的成绩;他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祖国创造着财富。作家、艺术家们看到了正气抬头、邪气下降,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日益恢复、发扬。作家为这种美好的景象奋笔讴歌,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要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这也是有据而发的。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阴暗和丑恶的现象。有些干部贪污、腐化、倚势欺人;有些干部养尊处优、居功自傲、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权;社会上刮着很多歪风邪气,诸如请客送礼、逢迎拍马、“后门”成灾;社会

主义财富受到糟蹋，人材被浪费，坚持正确的意见受到打击。作家、艺术家看到了这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现象，要用文艺作品去唤起人们的警觉，为无权无势的“庶民”讲几句公道话，鞭挞那些危害事业的丑恶现象，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可是，持这两种主张的人们，却又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相互指责和争吵。在一个时期里，所谓“歌德”与“缺德”之争，大有水火不相容、力图攻垮一方之势。在开过一次座谈会后，持歌颂主张的同志不讲话了，但心里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们和有着共同思想的同志聚在一起时，“把文艺搞乱套了”、“他们就是败坏社会主义”、“简直是给共产党抹黑”等等牢骚，溢于言表。另一次座谈会后，主张暴露的同志又憋了一肚子气。这些有共同语言的人谈起来时，“棍子、帽子又来了”、“把创作的积极性打掉了”、“人们不敢写了”、“逼使作家不敢触及现实生活，只好去写无关痛痒的故事了”等等说法，又沸扬而起。两种主张的分歧就是这么尖锐。也正因为这样，人们都说：“还是心有余悸”。

“悸”什么呢？主张歌颂的一些同志说，目前还是少说为好，如果你反对暴露，那你就会被戴上“正统派”的帽子。所谓“正统派”，就是思想僵化，就是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主张暴露的一些同志则说，现在说是不打棍子、不揪辫子，谁知哪一天又会来个不同形式的批判运动，照例还是把你打成什么名目的罪人。

有这两种“悸”，说明我们平心静气、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的风气还没有真正形成。同时，也正是上述两种主张本身存在的主观片面性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我就是要歌颂社会主义光明”，“我就是要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这都是从主观出发提出来的带有片面性和绝对化的主张。我们有个从苏联搬来的口号，叫做“干预生活”。所谓“干预生活”，意思大概是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无情地鞭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对这个口号，持歌颂主张的人们有点深恶痛绝，持暴露主张的人们

则喊得非常响亮。其实，“干预生活”这种外来的“桂冠”，戴到“暴露”这种主张的头上合适，戴到“歌颂”这种主张的头上也并非不合适。“我就是要暴露现实生活中的黑暗”，这是一种从主观出发的“干预”；“我就是要歌颂社会主义光明”，不也是一种从主观出发的“干预”吗！一言以蔽之，两种主张都可以称之为“干预生活”。

按照这种从主观出发的口号所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如前所讲，有时会符合客观的社会生活，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而且，这种口号在冲击粉饰生活这种违反艺术规律的倾向时，也曾起到其积极作用。但是，做为一种理论原则，则是不准确和不科学的。

社会生活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有着自己的轨道，循着自身的规律。这个规律反映在经济规律上，反映在由经济规律决定的政治规律上。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变化与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产生着人们对生活的各种看法与态度。我们不能想象林黛玉烫着某种发型，也不能想象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时期，会在我们城市的大街上出现穿着符合女性特征衣裙的美丽的姑娘。当然，社会生活绝不是只表现在表面现象上，更重要是表现在经济方面。当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随之而变，因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改变了，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基础，带来了人民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新的制度必然带来新的问题，有的则以新的形式承袭了旧制度的生活样式，有的则是新的制度的不健全带来的新的问题。这些，都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上面，而这个发展与变化又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党现在提出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从主观出发随意提出来的，而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象自主、联合、竞争等等事物的出现，又将带来新的问题，也将给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内容与形式。你不习惯和不希望出现的问题和生活形态，如果是发展的必然，则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谁想把历史拉回到“四人帮”统治时期

去,是绝然做不到的。所以,社会生活不是可以“干预”得了的,而只能是按照社会生活自身发展的规律因势利导,起促进作用。文学艺术有其不容否认的社会功能,但是,如果把这种功能捧得太高,过份夸大主观“干预”的作用,不管你歌颂也好,暴露也好,只要你违反生活的自身规律,不但起不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的手段,反映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下的社会生活。客观世界是基础,是根本。按社会生活自身的规律,努力真实地反映这种生活,这是艺术创作的根本规律。艺术作品不能强加于社会生活之上,也不应冷冷地站在社会生活之外,只能是对社会生活的忠实反映。离开了社会生活,生编硬造出来的、拔高出来的、片面夸大了的、图解概念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艺术,也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当然,那种脱离和歪曲社会生活的作品,由于某种社会因素,或者因为情节的离奇、带有一定刺激性,象过去的《火烧红莲寺》、《乾隆游江南》一类,象外国的凶杀与色情片、前不久出现的电视片《最后一幅肖像》等等,也可能一时取得某些人的吹捧和欣赏,但是,由于它们破坏了艺术,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因而败坏了艺术的特性和社会功能,人民和社会并不需要它们,它们都不会留诸后世。单纯地强调歌颂或暴露的作品,虽然有别于上述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也是好的,但是如果主观地从“歌颂”或“暴露”这种概念出发进行艺术创作,也便违反了艺术创作规律。而这种倾向,今天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就是我们的许多文艺作品(包括一大批为观众所不喜欢的电影)出现情节雷同、千人一面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

作家、艺术家如果不从生活而从概念出发,不按照社会生活自身的规律反映社会生活,在你进入创作时,头脑中闪现出来的不是你所熟悉的人和他们的生活场景,那么,你对社会即使认识得十分深刻、非常准确,你仍旧写不出好的艺术作品来。你只能是编故

事的大师，或者被观众和读者挖苦为图解报纸社论的巧匠。人民不要那种从主观概念出发的“干预”，不要离开生活的头脚倒置的艺术。违反了艺术创作规律的作品，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

社会生活是纷纭复杂的，然而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件事物，任何一个人，都和这个有机的整体紧密相联。做为一部作品或一件艺术品，自然不可能把生活反映得面面俱到。但是，它们却是整个生活大画面的一部分或一个侧面。它们是有机地镶嵌在整个社会生活大画面之中，而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包括孤岛上的鲁宾逊，也没离开地球上的人类生活。歌颂和暴露各有其合理性，但又都缺乏辩证的观点，因为它们只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也许有的同志会说，我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难道就不能成为艺术品吗？当然可以。但这个侧面必须是从全面的高度撷取或提炼而来。即使“伦敦的东头”这个侧面或仅仅写了一件事、一个人，也离不开这个道理。因为有这种不同，也就有了艺术质量的高低、优劣之分。恩格斯期望哈克纳斯把描写工人阶级的积极性，留给另一部作品，正是他不否定这部作品，而却感到了这一部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不够、准确程度不足。应该说，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容易由片面性发展为绝对化。好就是绝对的好，结果是粉饰生活、无限拔高，最后来个“三突出”、“高、大、全”。谁说不好就是从太阳上找黑点，就是反党，就是阶级敌人。坏就是绝对的坏，导致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干部都是坏的，外国资产阶级放个屁也是香的，荒诞、色情、封建的东西完全变成好的，《十八摸》、《黄氏女游阴》可以在某些地区演出而不受干涉，外国色情录相片可以高价私放，表现床上生活的靡靡之音的录音带成了一些人的宝贝。

综上所述，是否可以说“干预生活”这种提法，单纯地歌颂与暴露这两种主张，是不准确、不科学和具有片面性的呢？大体上是可以这么说的。至于具体问题，那只能对照客观实际做具体分析。事

实上,这种口号与主张,多年来给我们的文艺事业造成了很大混乱和不良影响。既然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根本原理谁都不否认,我们为什么要人为地搞出各种口号来搅乱这个根本性的、又是常识性的道理呢。作家、艺术家应该按社会生活自身的规律反映社会生活,要忠实,要老实,要象安泰不脱离大地那样。

当然,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世界具有能动性,不能否认世界观对作品的影响。艺术真实不是生活真实,进入艺术领域的真实都有其目的性与倾向性,有艺术家自己的艺术理想与审美标准。但是,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客观社会生活。忠于生活的伟大艺术家,完全有可能纠正其世界观的偏颇。要不,同情保皇党的巴尔扎克怎么会写出不朽的“人世喜剧”?因此,与其说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重要,倒不如说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更重要。

“写真实”辨析

“写真实”这一口号,也是从国外进口的。它被搬到中国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受到了批判和讨伐。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个口号才又被重新翻出来。

这一口号,在我国,无论是过去和今天,好象有个不成文的特定含意,即主要是指揭露生活的阴暗面(这大概和批这一口号时所强加的“罪状”有关)。为了科学地研究问题,今天必须恢复这一口号的本来面貌。

“写真实”这一口号,是斯大林针对“拉普”大肆鼓吹的所谓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提出来的。斯大林反对“拉普”用文艺去图解政治与哲学概念,他说:“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罢!如果他能以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他就一定会达到马克思主义”。^①

到了四十年代中期至五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苏联文艺上又

注 ① 转引自《斯大林论语言学著作与苏联文艺学问题》。

出现了一次错误。从一九四六年开始，苏联在思想战线上展开了一场批判运动，其中电影首当其冲。在《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中，严厉谴责了电影部长波尔沙科夫。同时，对爱因斯坦、特拉乌别尔格和普多夫金等著名导演也进行了点名批判。这一批判运动的结果，导致用政治概念图解生活、粉饰生活和无冲突论倾向的作品大量出现，使艺术作品失去了真实性与战斗性，造成了文艺上的危机。为了纠正错误，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真理报》发了一篇专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生活的革命发展中，描写它的真实——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第一条金科玉律。‘写出真实来’——斯大林这样教导我们的作家。”

这就是“写真实”这一口号的由来。应该说，斯大林当时提出这一口号，尽管不够准确，却是起着积极和良好作用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斯大林提出这一口号的含意。斯大林是针对图解政治与哲学概念、粉饰生活和无冲突论倾向而发的，决不是反对歌颂社会主义光明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也决不是把“写真实”做为揭露阴暗面的同义语。用《真理报》专论的话说，是“在生活的革命发展中，描写它的真实”。因此，它是泛指写出在社会生活进程中的诸多现象，既包括光明的，也包括阴暗的，又不排除中间的。而我们的许多同志，把这一口号理解为暴露黑暗，是绝然不对的。我们的社会中有阴暗面，有丑恶的东西，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社会中值得令人骄傲的事物、值得人们效法的先进人物层出不穷，为什么只有阴暗面才算“真实”呢！当然，这样提倡“写真实”的方法也是不对的，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光明，本质的真实才是真实，所以只有写光明才算真正的“写真实”。如果从这一简单的公式出发，便把整个社会的复杂性一笔抹煞了。整齐划一、一尘不染的光明社会，大概只能到其它星球上去寻找，地球上是不存在这种“真实”的。因此，从这个公式出发自然也“写”不出“真实”的社会生活来。

除了对“写真实”这一口号的理解上的问题之外，这口号又是

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整个社会生活是包罗万象的，从饮食男女、生活琐事到光明与黑暗，无不是真实的。如果把这些“真实”都写入作品，文学艺术岂不成了现实生活的照像。这样，也就会使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无法划清界限。自然主义也是追求真实的，不过它追求的是事实的真实、现象的真实与细节的真实，所以高尔基批评这种真实是“一分钟的‘真实’。”^②在文学上，公开打出自然主义旗帜的左拉，他的作品是真实的，他的作品也是有社会价值的，但他的自然主义的描写，则成了他作品的致命弱点。这使他无法象巴尔扎克那样，通过典型化的描写，无情地鞭挞丑恶现象，揭示出当时法国社会的本质。拉法格在评论左拉的自然主义代表作《金钱》时指出，他把“一切优点和一切缺点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结果是“只看见谁都看得见的现象的外表”，“不能在事件的主要的发展方面去深入，不能追究事件的原因，不能抓住它们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性。”^③拉法格尖锐地指出，由于左拉津津乐道地“对令人恶心的无耻的事件作多余的、仔细的描写”，把“丑恶弄得更丑恶了”，使一切龌龊“更为令人作呕”。^④同样，前一时期出现的小说《调动》和《黑玫瑰》，我们不能说作品中的许多事实不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在“写真实”。但为什么读起来使人不愉快甚至产生反感呢？因为它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

“写真实”这一口号再一个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地方，是容易叫人忽略在艺术作品中表达社会发展趋势。“写真实”，如果不加上许多解释，会叫人们理解为描写社会上的真实现象。假定这些真实现象包括光明与黑暗，那也不过是真实现象而已。社会生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解放前有“西安”和“延安”之分。“延安”又是从“西安”中变化出来的，最后“西安”不复存在了。解放后，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前后的不同。而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有六五年之前的生活与十年动乱之分。粉碎“四人帮”后，又

注 ② 高尔基：《文学书简》。③④ 拉法格：《文论集》。